

Sino-Indian Relations: A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

中印关系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随新民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Sino-Indian Relations: A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

ISBN 978-7-5012-3141-6



9 787501 231416 >

ISBN 978-7-5012-3141-6

定价：30.00元

中印关系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随新民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印关系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 随新民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5012 - 3141 - 6

I. 中… II. 随… III. 中印关系—研究 IV. D822. 33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8831 号

责任编辑 袁路明
文字编辑 颜 楠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封面设计 徐威明

书 名 中印关系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

Zhongyin Guanxi Yanjiu: Shehui Renzhi Shijiao

作 者 随新民 著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80 × 1230 1/32 14% 印张

字 数 3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7 年 5 月第一版 200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141 - 6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曲 星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关系不仅对两国来说非常重要，在当前全球化加速发展和国际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对双边关系又具有全球战略影响。目前，中印关系正处于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战略伙伴关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彼此信任与理解程度提高，悬而未决问题的谈判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双边经贸合作势头强劲，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也保持了良好的沟通与合作。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印关系历经坎坷，给两国人民留下的记忆也是非常深刻的。所以，研究中印关系就显得非常必要。随新民博士的这本学术专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通览全书，不难发现本书有如下几方面的学术特点。

首先，从社会认知视角研究中印关系，具有开拓性。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认知学派考察国际关系的切入点是决策者的个体心理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影响，本书作者无疑借鉴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杰里尔·罗赛蒂（Jerel Rosati）、史蒂芬·霍夫曼（Steven Hoffmann）等人的相关理论成果。但是，本项研究又不像认知学派那样把研究锁定在某一行为体的决策过程，而是把研究重点转向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互动和关系结构上。具体地讲，中印两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不再被视为黑箱，而是被视作常量，研究重点在于中印两国的认知（主体认知和客体认知）对双边关系进程和结果的影响，并试图在社会认知和中印关系之间建立起某种因果联系。据我所知，在中印关系研究领域，国内学术界尚没有采用此种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专

著性成果，这项研究是一种大胆且十分有益的尝试。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本书虽然没有专门讨论国家利益问题，但字里行间却彰显出一个基本理念，即中印关系的社会认知研究没有超越国家利益，所不同的是国家利益不再是先验固有的，而是两国在认知和行为互动中建构的，并在中印两国认知具体事件、外交政策和相关行动中体现出来。

其次，该书理论架构清晰，分析工具选取合理。社会认知吸收了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很难说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社会认知研究体系庞杂，涉及宽泛，影响主体认知过程和结构的因素自然也很多。本项研究没有面面俱到，在分析和借鉴社会认知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命题的基础上，只从价值信仰、国际环境、社会学习三个方面考察中印两国各自的自我认知和客体认知，并视这三个因素为影响认知过程的核心变量，从而建立起一个“价值信仰、国际环境、社会学习——认知互动——中印双边关系”分析模型。该分析模型是适中的，据此研究长时段的中印关系演变，可操作性强。

第三，本书从问题入手，然后是理论假设和实证分析，研究过程规范。中印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除了物质结构外，社会场中的主体认知在中印双边关系演变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以何种机制作用于中印关系？这是本书开篇就提出的研究问题。依据这样的逻辑思路，认知和中印双边关系互动之间便具有一种因果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部分，案例分析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作者依据统一的标准——代表性、全局性和持续性——选择边界问题、安全问题、西藏问题三个案例；这既避免了因对中印关系分期不当引致的问题，又使研究过程更具操作性；内容分析的文本主要是中印两国公开的政府文献或领导人讲话，文本来源真实可靠，用于定性或定量分析的数据系统，验证过程规范严谨。

本书的研究过程沿两条线推进，一条是中国和印度各自的认知，分析双方的认知过程、结构以及来源；一条是双方的认知、行为互动与中印关系的演进。如在边界问题上，中印两国认知对立，

两国总理之间的信函往来、外交照会互动、外交谈判等没能解决问题，军事冲突和边境战争使双边关系恶化敌对，双方相关认知、政策和行为模式在长期冷漠状态下的微调、新的国际环境下中印关系的改善等都是沿着这两条线展开的。两条线交织并行，这无疑增加了驾驭研究过程的难度，但本研究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第四，从社会认知视角评估 1949 年以来的中印关系，本书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同两国彼此间的总体知觉路径（从非敌非友到善意友好、到敌对威胁、再回归到非敌非友）相对应，中印双边关系也经历了分歧接触、友好合作、边境冲突与战争、敌对冷漠、竞争合作的轨迹；社会认知既有相符、固化、失调等内在逻辑，又有学习、调整、创新等属性，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中印关系更多地呈现出前一种特性，而 90 年代以来的双边关系则更多地表现为后一种特征，这也正是中印关系的希望所在。应当说，这一判断是中肯的，也与中印关系的实际进程大体吻合。

本书的雏形是随新民在外交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我很了解作者的为人和研究能力。随新民博士为人谦和，学习认真刻苦，也敢于创新，在有关中国外交和中印关系的研究论著中提出了一些很独到的见解。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够丰富中印关系的研究文献，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因此，我很乐于向读者推荐这本学术著作，同时也祝随新民博士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2007 年 4 月 2 日 于巴黎

>> 内容摘要

中印关系的社会认知研究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不再是先验固有的，而是两国在认知和行为互动中建构的，并在中印两国认知具体事件、外交政策和相关行动中得以体现。抽象的国家利益概念也因此而变得具体化、可操作化。这样，中印两国的认知（自我认知和客体认知）就同中印关系（结构与进程）形成因果关系，即两国的相互认知构成自变量，而中印关系则是因变量。

社会认知不同于元认知心理学上纯粹的生物性心理分析，在社会认知视野下，认知主体的价值信仰（含历史传承）、学习过程、环境因素就成了影响中印两国认知的核心因素。这些因素作为社会认知变量的子变量实际上构成了中印关系的远因。中印关系的曲折历程就是两国认知与相关行为互动的逻辑结果。

中印两国的相互知觉决定两国的政策选择与行为模式，进而形成双边关系结构。基于社会认知的本质——主体感知客体，中印两国的认知过程和结构出现错误知觉在所难免，再加上认知相符、诱发定势、认知固化、愿望思维、认知失调等属性，两国之间一旦出现错误知觉或知觉错位，就极易进入一种恶性的互动螺旋状态。中印关系中的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安全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些特性。中印边界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两国在西藏问题上龃龉不断，在传统安全领域互信程度很低。中印双边关系除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短暂的“印地—秦尼—巴伊巴伊”（印中两国人民是兄弟）外，大部分时间处于敌对或冷漠状态。

同中印两国彼此的总体认知路径——从非敌非友到善意友好、

到敌对威胁、再回归到非敌非友——相对应，两国关系也经历了摩擦合作、友好合作、边境冲突与战争、敌对冷漠、竞争与合作的轨迹。

认知相符、认知固化、认知失调机制等属性并不排斥社会知觉的可变性。认知主体的信仰（结构和内涵）在持续外压下的转向、学习过程的功效、国际环境的变化等也会使中印两国的相互认知结构发生渐进性的调整，进而促使双方优化决策过程、调整行为取向与行为模式、重构双边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的改善就印证了社会认知的这一逻辑。加强交流沟通、善于学习和反思可以提高知觉与事实的契合度，减少或避免认知中的错误知觉，这是中印关系走出困顿、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睦邻伙伴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观念基础。

在社会认知视野下，中印边界问题的症结在于两国对边界认知的错位和印度方面对中国的错误知觉，从很大程度上讲，错误知觉是中印边境冲突的前奏。在安全领域，中印两国的相互知觉是不对称的：印度始终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对手或潜在的安全威胁，而中国在绝大部分时段里并不把印度视作自己的安全威胁。安全互信程度不高决定了中印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密切的安全合作。西藏问题同边界问题、安全问题密切相联，印度的认知思维惯性和双轨政策致使西藏问题长期成为中印关系良性发展的制约因素。社会认知既有相符、固化、失调等内在逻辑，又有学习、调整、创新等属性。就中印关系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国关系更多地呈现出前一种特性；而90年代以来的双边关系则更多地表现为后一种特征，这也正是中印关系的希望所在。

中国和印度都参与了东亚合作进程，东亚共同体建设给中印互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但是，这既是机遇又意味着挑战。机遇源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启动和加速发展以及合作效益的“外溢”和发散功能，即可以延伸到东亚区域合作以外的多边和双边关系领域；挑战则来自观念转变和认知颠覆的艰难。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曲折起伏，既有巅峰时的“潘查希拉”原则和“印地—秦尼—巴伊巴伊”，又有低谷时的兵戎相见和此后长期的僵冷敌视。中印两国之间的确存在着分歧，但关系恶化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两国都不希望从边界纠纷走向边境战争。而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事实则与双方的愿望相反，为什么？中国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大都先后得以妥善解决，为何中印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并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印度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保留。两国在西藏问题上也是齟齬不断，这又是何故？在后冷战时期，国家安全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合作安全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的认同，中印关系也得到明显改善，印度为何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始终对中国颇有微词，甚至禁使产生这样的疑问——除了物质结构等因素外，社会文化的主观认知因素在两国关系的演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起作用，又是以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中印关系呢？

从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来看，个人、国家、体系三个分析层次^①都对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关系现象作了解读，三者各有所长，也都有内在的缺失。因此，我们也很难判断孰优孰劣。就国际关系研究现状而论，国家层次和体系层次的研究占着绝对的优势，而且大多集中于物质力量层面的考察。虽然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一种个人回归国际社会的现象，但是，这毕竟无法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相比，个人层次研究的关注点仍然集中于决策分析，而非直接研究国际关系。个体处于一个社会“场”中，从个体视角分析国际关系丝毫不排斥战略因素、外界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但是，“社会场”如果没有被行为体感知也就没有社会意义，那么行为体的社会认知对国际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再往前追溯，又是哪些因素导致行为体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知觉呢？决策分析对此作了部分的回答。

在当代国际社会，虽然个体作为国际进程的参与者已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民族国家仍是居主导地位的行为体，个体精英的意向又往往通过国家意向（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的过程）得以体现，而国家意向又依附于政治精英个体的认知。这一辩证关系正是联系中

① 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最大的优点是使国际关系研究中设定的变量关系更加清晰，即层次分析法假定某个层次或几个层次上的因素会导致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最早使用层次分析法研究国际问题的是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他在探讨国际战争原因的著作《人、国家、战争》（1959）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三个“意象”，即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体系因素。使用系统研究层次分析法的则是美国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教授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他在《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1961）一文中明确提出层次分析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并认为国际关系包括两个主要的层次，即国际系统和国家。国际系统是最全面、最具综合性特征的层次，是从宏观层次把握国际关系规律；国家则是微观层次，是研究者了解国家政策和行为细节的层次。此后，研究分析越来越细，詹姆斯·罗斯诺（James Rosenan）在《外交政策的科学研究》（1980）一书里提出五个分析层次：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系统。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Bruce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在《世界政治：可供选择的菜单》（1992）一书中进一步细分为六个层次：决策者个人、决策者角色、国家政府、国内社会、国际关系、世界系统。参见秦亚青：《层次分析与国际关系研究》，载《欧洲》1998年第3期。

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纽带。所以,从认知角度考察中国外交绝不仅限于微观个体,中观层面上的国家认知才是影响国际关系(进程和结构)更为直接的动力。所以,本课题把国家政治精英的认知过程视作角色行为,在分析层次上属于中观层次的国家认知研究。

就中印关系而言,国家政治精英的认知与中印双边关系有无内在的联系?如果有联系,两个变量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双方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构(主要考察社会认知的第一个阶段——知觉或错误知觉)又是如何推动或制约中印关系的发展呢?中印双方如何才能克服现存的制约因素而使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社会认知分析离不开国际系统环境(主要是国际结构与进程)、中印两国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用社会认知工具研究国际关系不同于外交决策分析,决策分析重点考察某一行为体的单向认知过程及其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而社会认知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则必须考虑双方的认知互动,研究重点已经超越了对决策黑箱的探究,而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认知对国际关系进程和结构的影响。一个时期的国际关系结构就是行为体之间认知和相关行为互动的结果。行为体的认知和行为互动过程既依托既定的外在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包括历史传统、政治信仰、社会规范等),又建构新的环境、观念、规范。

就中印双边关系而言,新的建构过程,即在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观念和共有文化^①,是中印关系走出困顿的根本路径。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在认知过程中构筑共有观念和文化不仅在理路^②上可行(都部分地属于行动者赋予客体以意义的观念范畴),而且在实践上也意义重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印关系实践似

① 社会建构理论特别强调“共有文化”或者说“共有知识”的意义。秦亚青教授在评介温特建构主义理论时给“共有知识”下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定义,即“共有知识”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在这个环境中,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前言,第24页。

② 所谓“理路”,这里是指事物发展演变的理论轨迹和逻辑路径。

乎正在印证这一逻辑。

二、选题的意义

学界现有研究无疑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印关系进程作了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方法均体现出了各自的长处。但是，从社会认知视角来分析中印关系的研究成果极少。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学界的主流方法还是强调物质层面上的因素，多从大战略、权力结构、地缘政治角度来讨论分析问题，而很少有学者去关注非物质层面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雅科夫·Y. I. 弗尔兹伯格（Yaacov Y. I. Vertzberger）、史蒂芬·A. 霍夫曼（Steven A. Hoffmann）和苏珊·L. 史尔克（Susan L. Shirk）等个别学者从政治学或认知心理学角度考察中印关系，但他们的研究多是单向的，即印度视角的研究；再者，在研究内容上，其研究也都聚焦于印度在中印边境危机期间的对华决策过程，而并非双边关系。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为科学研究通过决策分析或危机管理部分地波及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领域，主观层面的认知心理被列入中印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研究的议程。相关研究成果有阿尔伯特·坎特里尔（Albert H. Cantril, Jr.）的《印度对中印边境冲突的认知》^①、雅科夫·Y. I. 弗尔兹伯格的《外交决策中的错误知觉：中印冲突1959—1962》、史蒂芬·A. 霍夫曼的《印度与中国危机》。

阿尔伯特·坎特里尔利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了印度对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冲突事件的认知。坎特里尔选用1962年夏末和同年11月两次对印度公众的问卷调查为配对样本（样本量分别为2366、2014），问卷设计采用“自我评定等级”（self-anchoring

^① 详见 Albert H. Cantril, Jr., “The Indian Perception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Clas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8, Summer 1964.

striving scale) 测量模式^①，问卷涉及印度公众对国家认同、对外结盟与不结盟中立、中国的形象——所谓“侵略”与“威胁”等方面，通过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印度并不像许多人认知的那样缺乏国家认同感，而是一个国家认同感很强的民族；中国的“侵略”呼唤印度加强防御力量的建设，但是印度不能以牺牲国家独立为代价；边境冲突反映出的只是中国对印度的“侵略”，而非“共产主义的侵略”。坎特里尔的调查设计和统计分析过程是精细的，统计推断也是中肯的，基本上反映了印度国内公众在中印边界危机期间的即时认识和主流舆论。但从问卷涉及的领域看，其价值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再者，从一般意义上讲，公众舆论和民意总是处于外交决策的边缘，在危机管理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坎特里尔的研究是在公众层面上对印度有关中印边境冲突的知觉与看法，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涉及国家决策层对中印边界的具体认知形态，更不可能涉及认知的来源问题，这超出了其研究议程。

雅科夫·Y. I. 弗尔兹伯格的研究旨在通过对尼赫鲁的观念、性格、态度研究，揭示决策过程中错误知觉的动力机制和错误知觉的常态性，1959—1962 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和战争只是一个案例，正如作者开篇所说，研究遵循“理论—经验”结合方法，中印边界冲突是最典型、最能印证错误知觉和错误计算引致国际危机的案例。^② 在研究设计上，文本内容分析、编码、统计推断是主要的手段，研究方法则是定性与定量结合；其理论架构和论证的重心在于所谓“客观环境”与心理环境之间的差异和交换对信息加工过程的影响、编码和解码中的错位对决策进程的影响，以及环境因素如

① “自我评定等级” (self-anchoring striving scale) 量表设计、编码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即被采访者对理想目标的预期和对现实状况的评价。从现实的最差状况到最期望的目标共分为 10 级，被采访者自我评估所处的等级。参见 Albert H. Cantril, Jr., “The Indian Perception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Clash”,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28, Summer 1964, pp. 233-234.

② Yaacov Y. 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84, p. xvii.

何通过认知形态和认知过程作用于决策过程。弗尔兹伯格研究议程中的“环境”包括全球、地区、国内、双边关系环境几个层面，而对于影响决策者认知过程的价值信仰、政治传统、战略文化则没有作系统的分析研究。由于研究设计是基于个体层面的，所以弗尔兹伯格对尼赫鲁的个性特点以及相关内容的分析很精细深刻，但同后来霍夫曼的研究一样，弗尔兹伯格的研究忽略了社会化进程对领导人认知的影响，学习自然被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此外，对印度有关中印边界认知形态的研究也较为欠缺。

霍夫曼的《印度与中国危机》一书关注的是危机决策行为。作者希望通过史学和政治学方法的很好结合揭示危机决策的一般规律，中印边境危机是验证规律的案例。正如决策分析学者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评价的那样：对印度在压力下的行为的认知分析同时也揭示了所有政府面临外交政策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惊人共性。^① 霍夫曼的研究分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三个阶段，对每个阶段决策者的心理环境和个人信仰作了考察。^② 其研究有一个无须验证的潜在命题，即1959—1962年中印危机的根源在于边界纠纷，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决策过程中政治精英的心理环境、心理固化（mental rigidity）、信仰因素的功效，但研究并没有涉及印度对中印边界认知的具体形态。其次，作者对信仰的界定也是偏狭的，认为信仰表现为历史性边界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而未涉及印度的政治哲学、文化传统。再者，霍夫曼是把态度和信仰混淆在一起，也没有区分信仰与知觉这两个概念。此外，作者是在“态度棱镜”（attitudinal prism）主题下分析印度对中印边界的看法和对中国的反应，^③ 未阐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逻辑关系。虽然他的《印度的认知和对华政策》（*Perception and China Policy in India*）一文发

① 见 Steven A. Hoffman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Foreword, p. xi.

② Ibid, pp. 47 - 50, 165 - 167, 215 - 217.

③ 文章本身并没有对“信仰”的内涵作界定，但从论证过程可以明显地推导出作者的倾向性。

展了先前的观点并拓展了研究议程和时空，但并没有超越原有局限性。^①当然，这同霍夫曼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设计是相对应的，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仅仅是国际危机决策与行为管理中的一个细节，而非主线，研究过程也不可能更多地关注认知环节。

总之，弗尔兹伯格和霍夫曼等人的研究仅限于危机管理和决策分析，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决策黑箱”研究，研究重点自然不是基于中印双方的认知和行为引致的双边关系。在国内学术界，中印关系的认知研究还是一项空白。也正是这种研究上的缺失，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也正是选题的学理意义所在。至于中印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那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课题研究的难点

1. 从中印双方的认知和行为互动来考察中印关系，课题研究过程一直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印度方面的认知过程和结构以及相关知觉的来源，另一条线索是中国方面的认知过程和结构以及知觉来源。两条线索又必须统一于互动过程，而这一过程头绪较多，再加上认知互动交错，所以把握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2. 实证部分的案例分析主要以文本分析为主。中印边境战争前后，两国先后公开了往来的外交照会或备忘录等文献，1963年以前的政府文献比较充分。但此后双方的相关文献则没有公开，外交档案尚未开放，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缺乏，这为社会认知研究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的统计带来很大的困难。许多时候，研究不得不采用官方文献之外的其他材料。

^① 见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 - 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3 - 74.

四、研究方法

从分析层次上看，本研究主要是在中观国家层次上考察中印关系，但个体层次（尤其是领导人的角色行为）和体系层次的分析对于知觉的形成、调整又不可或缺。所以，本研究过程涉及个体、国家、体系三个维度。这也正是社会认知研究方法的特长。

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本研究坚持物质主义和科学实在论。但是，认知主体的观念和思维惯性在主体感知外在事实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主体认知赋予所谓“客观事实”以社会意义。

在方法论上，本课题坚持整体主义，把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变量（如信仰体系、操作码）、社会层次变量（全球结构和地区结构环境）、文化层面变量（如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国内和国际规范）结合起来。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力图把理论推演和经验归纳、定性陈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鉴于研究是从中印双方的认知互动来考察双边关系的演进，这里也运用比较分析方法。

五、篇章结构

绪论部分主要涉及问题的提出、选题的意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课题研究遇到的难点。

第一章全面地梳理了中外学界关于中印关系的研究状况，指出国内学术研究存在的缺失——从社会认知视角研究双边关系（超越决策分析）至今尚无人涉足；即使在国外学术界，从双方认知互动来研究中印关系的成果也尚未发现。

第二章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涉及基本概念的界定、社会认知研究的基本命题、中印关系研究中的变量关系和基本